

「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

沈志華**

摘 要

中共與北朝鮮在戰後相互幫助，醞釀中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構成了他們之間同盟的基礎。在史達林的支持下，金日成搶先發動了戰爭，而毛澤東決定推遲《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為了儘快結束朝鮮戰爭，毛澤東急於派兵入朝作戰，金日成反覆多變，在莫斯科的沉默下拒絕中國出兵援助，毛澤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決心孤軍對美作戰。戰爭期間，莫斯科在主要戰略問題上都支持中國的主張，金日成感到屈辱和壓抑。朝鮮戰爭結束後，金日成開始傾向於朝鮮的獨立發展，並首先肅清黨內的異己力量。中共與金日成在對朝鮮勞動黨內延安派的處理問題上發生衝突，中朝同盟陷入危機。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開始出現分歧，毛澤東需要朝鮮的支持，從而對金日成採取了容忍的態度，甚至主動提出從朝鮮撤軍，中朝關係得以改善，並於1961年簽訂了雙邊條約。中朝同盟並不是他們自己宣傳的「唇齒相依」的關係，而是內部充滿矛盾的極不穩定的「政治聯姻」。

關鍵詞：毛澤東、金日成、中朝關係、冷戰

* 收稿日期：2008年11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2月6日。

** 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歷史系教授

前 言

中朝關係在中國大陸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相關的檔案文獻也異常難尋。所以，在若干年前論及到這個問題時，除了老生常談的官方宣傳，真正的學術研究在中國幾乎是看不到的。所幸的是，最近十幾年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有關朝鮮問題檔案文獻的不斷解密，這一時期中朝關係的真相開始有所顯露，於是人們就可以逐步地掀開鐵幕，考察現代中朝關係的歷史進程了。¹

儘管從法律意義上講，中朝同盟是 1961 年 7 月正式形成的——那時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但幾乎沒有人否定，自 1950 年中國出兵朝鮮開始，雙方的同盟關係實際上就已經確定下來。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從抗美援朝運動開展以來，談到中朝關係，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彙就是「唇齒相依」，以此表明這兩個國家休戚與共，命運相連。²當年甲午海戰，中國就是為了保護朝鮮，不惜以初建的海軍與日本鐵甲艦拼殺，結果一敗塗地。如今，又是為了挽救朝鮮，中國新政權再次不惜冒著引火燒身的危險，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對陣。仔細品味，中國這兩次為援助朝鮮而出兵作戰，確有「唇亡齒寒」的擔憂。不過，隨著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革命形勢的出現，特別是冷戰格局的形

¹ 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和中國檔案的英文本，主要發表在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的不定期刊物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上，俄國檔案的中文本見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以下簡稱《朝戰解密文件》。關於中國發表的有關檔案文獻，除以前人們熟知的外，最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提供了許多新的材料。涉及到中朝關係的重要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以及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修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來自大陸，為了與所引中、俄文檔案文獻統一，本文對一些概念的表述沿用了大陸的說法。如朝鮮戰爭（韓戰），朝鮮或北朝鮮（北韓）等。

² 經筆者粗略統計，從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2 月兩年期間，僅《人民日報》刊登的報導和文章，就有 66 篇以「唇齒相依」一詞來形容中朝之間的緊密關係。

成，歷史上影響中朝關係的地緣因素和情感因素，已漸漸退居次要地位，不斷凸顯出來的則是革命的和政治的因素。這無疑是觀察現代中朝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問題在於，早已形成的中朝同盟關係為什麼要十一年後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

本文擬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及口述史料，詳細考察中朝同盟關係建立和延續的歷史過程，即 1946 年夏天中朝非正式「同志關係」建立的背景，1950 年 10 月中國出兵朝鮮的曲折經歷，1956 年圍繞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中朝關係的變化，1958 年志願軍主動全部撤出朝鮮的緣由，以及 1961 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簽訂過程，試圖說明在冷戰背景下這種同盟關係的本質特徵。

一、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結合在一起

近代以來，中國和朝鮮同時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威脅，共同的命運把它們聯繫起來。日俄戰爭，特別是 1910 年日本吞併朝鮮以後，大量的朝鮮人移民中國東北，並在那裏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³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分散在中國北方的各種朝鮮抗日力量逐步聯合起來，歸屬到中共和八路軍的領導下。1941 年 1 月，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武亭(Mu Chong)為會長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同年 6 月，成立了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直接受八路軍統轄。1942 年 7 月，在中共的支持下，聯合會改名朝鮮獨立同盟，由金料奉(Kim Tu-bong)、崔昌益(Choe Chang-ik)領導，同時將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擴編為朝鮮義勇軍，總司令為武亭，副司令為朴孝三(Pak Hyo-sam)、朴一禹(Pak Il-u)。戰爭結束前夕，朝鮮獨立同盟主要領導幹部全部集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批年輕幹部如徐輝(So Hwi)、尹公欽(Yun

³ 參見朴宣冷，《東北抗日義勇軍》（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с. 135-160.

Kong-hum)等加入同盟的領導班子。⁴後來，這批人陸續回到朝鮮，成為勞動黨內「延安派」的主體。

朝鮮光復後回國的還有一批幹部，就是以金日成(Kim Il-sung)為首的「游擊隊派」。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金日成於 1930 年代初來到中國東北，並受中共中央委託在吉林組織抗日游擊活動，擔任過團、師的政委，後來成為東南主要戰線的指揮官。⁵在日本關東軍的大規模圍剿下，少數倖免於難的游擊隊員，於 1938-1942 年陸續撤退至蘇聯遠東地區，在那裏接受軍事訓練，並補充彈藥和裝備。1942 年 7 月，蘇聯遠東方面軍受命在哈巴羅夫斯克市以東地區組建了第 88 獨立步兵旅，旅長是中共黨員周保中。金日成帶領其殘餘部隊於 1942 年加入 88 旅，被分配在基本上由朝鮮人組成的第一營。金日成表現出眾，俄語學得快，多次受到表揚，很快成為這支朝鮮人隊伍的核心人物。1945 年日本投降後，金日成和他的戰友金一(Kim Il)、姜健(Kang Gen)、崔庸健(Choe Yong-gon)等人於 9 月中旬被蘇聯人送回朝鮮，金日成成為蘇聯占領軍在平壤代表的助手。⁶不久，由於美蘇關係惡化，以三八線為界由美蘇分區占領的朝鮮半島的政治局勢也緊張起來。1945 年 12 月莫斯科會議以後，蘇聯占領當局逐漸把以曹晚植(Cho Man-sik)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者排擠出政治舞臺，而扶持金日成上臺，並聯合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代表、「莫斯科派」的代表人物許哥而(Ho Ka-yi)以及來自南方的朝鮮共產黨代表、「南方派」代表人物朴憲永(Pak Hon-yong)、朴正愛(Pak Chong-ae)等，建立起親蘇的北朝鮮政權。⁷

在戰後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運動中，出現了一股由共

⁴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1921-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269-273、299；劉金質等編，《中朝中韓關係文件資料彙編(1919-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727、801。

⁵ АПРФ, ф.3, оп.65, д. 840, л. 16, Почтар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140.

⁶ ЦАМОРФ, ф. 1896, оп. 1, д. 1, л. 1; д. 4, л. 29, Почтар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 140-143.

⁷ 詳見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pp. 1-48；康仁德編，《北韓全書》(首爾：極東問題研究所，1974)，上卷，頁 254-255；徐大肅著，徐柱錫譯，《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首爾：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頁 112-113；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 29-44。

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鬥爭實踐中也努力尋求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在 1947 年冷戰爆發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後，各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便逐步趨向為同一目標和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和北朝鮮結合在一起，爲了各自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他們同心協力，互相支援。於是，由於地理原因形成的「唇齒相依」的關係，又注入了革命的（即政治的）因素。

1945 年 8 月 11 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延安發布第六號命令，要求朝鮮義勇軍立即隨同八路軍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僞」，同時準備解放朝鮮。⁸8 月 12 日、15 日和 18 日，朝鮮獨立同盟總部先後發表了三個文告，號召日軍中的朝鮮士兵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呼籲朝鮮僑民加入朝鮮義勇軍，爲建立一個新的朝鮮共和國而鬥爭。⁹10 月 27 日，先期趕到東北負責接收工作的陳雲報告，中共長春市委決定派出大批幹部到長春以西地區，任務是「擴大部隊，發動群眾，接收政權」。¹⁰與此同時，第一支到達安東的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遭到蘇聯占領軍的阻攔，以盟國有關三八線的約定爲由，不許他們進入朝鮮境內。於是，在 11 月初武亭率領 3,000 餘名義勇軍戰士到達瀋陽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只派少數領導幹部去朝鮮，大部份指戰員留在東北，編爲 7 個支隊（實際組成的是第一、三、五、七支隊），到各朝鮮族居住地發動群眾，擴充軍隊，爲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積蓄力量。12 月 13 日，武亭、金科奉、崔昌益等僅率 70 餘人乘坐蘇聯方面提供的火車到達平壤。¹¹這批留下的部隊迅速在朝鮮族中擴充，後來編入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在內戰時期，吉林延邊五個縣朝鮮族

⁸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 15，頁 223。

⁹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1921-1945)》，頁 389-390。

¹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卷 1，頁 447-452。

¹¹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1921-1945)》，頁 394；李香淑，〈關於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11 月）；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 年第 3 期，頁 56。

參軍者達 34,855 名，此外還有約 10 餘萬朝鮮族人參加了公安部隊、民兵等地方武裝組織。¹²

由於中國內戰（特別是在東北地區）的複雜局面，以及朝鮮義勇軍的主要幹部已回朝鮮，其編制也已經撤銷，中共高層與朝鮮方面便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49 年。¹³不過，中朝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中斷，通過中共東北局在朝鮮建立的辦事處，兩國革命者繼續密切往來，互相幫助。

在東北內戰初期，中共面臨巨大困難，特別是在南滿地區，由於與北滿的聯繫被國民黨切斷，環境十分艱苦，不得不求助於朝鮮。南滿與朝鮮一水相隔，兩國邊界長達 800 公里，水路交通緊密相連。1946 年 7 月，中共東北局在平壤組建駐朝鮮辦事處，朱理治擔任全權代表。通過辦事處，中共東北局幹部與朝鮮領導人恢復了聯繫。朱理治與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領導人來往密切，更經常與朴一禹、武亭、姜健等延安派幹部豪飲憶舊。就連駐朝蘇軍將領，也喜歡到辦事處來飲酒吃菜，聯絡感情。¹⁴

據 1947 年 6 月 27 日朱理治給東北局的報告，通過辦事處，朝鮮方面向東北局提供了大量幫助：一、接收傷病員和家屬。通化、安東失守後，中共有 1.5 萬多名傷兵和家屬退到北朝鮮，分散安置在朝鮮居民家中；二、供應物資和武器裝備。到 1947 年 6 月，供應（部份是通過交換）東北局的物資共 4 批約 800-1,000 個車皮（以軍用物資為主）。其中繳獲後留存朝鮮的日本軍用物資是金日成建議並主動幫助中共向蘇軍索要的；三、接待中共過境人員。九個月來，共安排東北局幹部、一般人員和轉運部隊總計約 2 萬人；四、幫助保存

¹²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檔案館編，《延邊地委專署重要文件彙編》，第 1 集（1986 年 12 月），轉引自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收入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第 7 輯，頁 265-288。關於朝鮮族部隊的編制及參加作戰的詳細情況，參見中國朝鮮族歷史足跡編輯委員會編，《勝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頁 57-83。

¹³ 在 1946-1948 年中共的《解放日報》、《晉察冀日報》和《人民日報》在報導朝鮮情況時，將勞動黨譯為勞工黨，金日成譯為蓋彌生或金貽蓀，金科奉譯為金托本和金科鳳，朴憲永譯為柏亨寧。中共高層對朝鮮情況不熟悉，由此可見一斑。詳見劉金質等編，《中朝中韓關係文件資料彙編(1919-1949)》，頁 1217、1249、1403-1575。

¹⁴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468-470。

和轉移物資。中共撤退後暫交朝鮮保存的物資 2 萬多噸，往來都有朝鮮勞動黨員幫助搬運。東北局通過朝鮮轉運的物資，只收不足百分之一的稅率，運價也較便宜，有的則免交運費。在緊急運輸時，朝鮮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運。總之，正如金日成在給林彪的信中所說，對於中共的要求，「他總是盡力幫助的」。朱理治總結說，對於中國革命鬥爭來說，北朝鮮起了「大後方」和「橋樑」的作用，實現了東北局「以北朝鮮為變相的、隱蔽的後方來支援南滿作戰」的意圖。¹⁵從 1947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初，中共通過北朝鮮轉運和交換的物資多達 52 萬餘噸，過境人員 2 萬餘人。1948 年，僅通過圖們—南陽口岸過境的就有 8,685 人。東北局的很多重要幹部，如陳雲、李富春、朱瑞、劉亞樓、蕭華、張愛萍等，都曾數次途經朝鮮，後來不少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和海外華僑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李濟深、沈鈞儒、張瀾、馬敘倫、蔡廷鍇等，也是從香港取道朝鮮轉入中國大陸的。¹⁶

當然，援助都是互相的。中共對朝鮮的幫助主要是提供糧食和兵員。1946 年夏秋之交，金日成找到從延安返回朝鮮的丁雪松，請她與東北局負責人聯繫，支援朝鮮一些糧食。據朱理治報告，到 1947 年夏，經劉亞樓送去 1 萬噸，東北局又送了 2,000 噸，連同物資交換，總計向朝鮮提供糧食 3 萬噸左右。¹⁷中共提供的最大幫助應是以原朝鮮義勇軍和東北民主聯軍中的朝鮮族官兵為主體，協助北朝鮮建立了一支軍隊。1946 年 8 月以後，金光俠(Kim Kwang-hyob)、姜健、崔光(Choe Kwang)等分批帶領在東北境內的部份朝鮮族部隊回國，並接受了蘇聯顧問的指導。1947 年 2 月 8 日，朝鮮人民軍成立大會召開時，這批回國的戰士組成了人民軍第一師團，金雄(Kim Ku)任師團長，姜健任參謀長。

¹⁵ 朱理治給李富春轉東北局的報告（1947 年 6 月 27 日），朱理治給東北局的政治報告（1948 年 8 月 24 日），參見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239-241、242-244。

¹⁶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頁 461；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第 17 輯，頁 197-200、202-204。

¹⁷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頁 239-241；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天津日報》，2001 年 3 月 14 日，專副刊第 11 版。

這是第一支從中國回到朝鮮的軍隊。此外，據不完全統計，從 1946 年至 1949 年 3 月，從東北解放區陸續回到朝鮮的軍事幹部和軍校學員近 800 名，這些在中國經歷過戰鬥洗禮的軍官構成了朝鮮人民軍的骨幹力量。¹⁸

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金日成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都認識到相互幫助的重要性。金日成曾說：「協助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朝鮮共產主義者和人民崇高的國際主義任務」，「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我們祖國的發展和安全也是有益的」。¹⁹毛澤東也堅持認為，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應當團結起來，「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²⁰正是在這種政治理念的基礎上，雙方互相援助，金日成爲中共提供了庇護所，而中共幫助北朝鮮建立了軍隊。當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成功的時候，人們甚至考慮要成立亞洲共產黨聯盟。顯然，此時中朝之間仿照中蘇條約建立一種正式同盟關係的基礎已經成熟，但這一進程卻被朝鮮進一步的革命舉動所中斷。令毛澤東感到驚訝和不滿的是，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事先未同北京商量便與金日成做出了發動戰爭的決定。毛澤東被迫接受了既成事實，但決定推遲擬議中的《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²¹

二、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心和金日成的反覆

朝鮮開戰不到 3 天，史達林和金日成沒有想到也不願看到的情況終於發生了——美國決定全面參戰。1950 年 7 月 2 日，中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向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A. Roshchin)通報說，考慮到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中國將組

¹⁸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頁 241；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 年第 3 期，頁 58；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收入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 7 輯，頁 265-288。

¹⁹ 《金日成全集》（平壤：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93），卷 8，頁 284-389。

²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 66、94。

²¹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 129-158。

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 3 個軍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²²儘管當時人民軍的進攻十分順利，但在美國已決定參戰的情況下，也必須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於是，史達林馬上表態支持周恩來的建議：「我們認為立即集中 9 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²³史達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²⁴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 6 月 30 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後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援，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²⁵7 月 12 日，周恩來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在這場戰爭中盡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幫助。同時，希望向中國「提供比例尺分別為 1 比 10 萬、1 比 20 萬、1 比 50 萬的朝鮮地圖各 500 張，並通報朝鮮前線戰況」，還要求「儘快送來朝鮮人民軍軍服的樣品」。金日成及時向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但什特科夫有意迴避了這個問題。²⁶

7 月 19 日，金日成又向蘇聯使館報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與毛澤東會談的

²²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сс. 35-37. 實際上，建立東北邊防軍的正式決定是 7 月 13 日做出的，於 8 月上旬完成集結的部隊共 4 個軍及 3 個炮兵師，總計 25.5 萬人〔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 108-109〕，而周恩來提前十幾天就將這個打算告訴蘇聯人，說明了中國領導人急切和焦慮的心情。

²³ 史達林致羅申電，1950 年 7 月 5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79.

²⁴ 史達林致羅申電，1950 年 7 月 8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82.

²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上卷，頁 51。柴成文是戰爭期間中方保持與金日成直接聯絡的聯繫人。

²⁶ 什特科夫致史達林電，1950 年 7 月 15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л.303-305.

情況：毛澤東認為美國將長期參戰，並會在朝鮮投入更多的兵力。他建議金日成「命令部隊停止向敵人進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並答應向朝鮮提供一批武器和軍用物資。毛澤東還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為此準備了 4 個軍，共 32 萬人，並希望金日成於 8 月 10 日以前通報自己的意見。當金日成詢問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時，什特科夫答覆：一無所知。金日成又說，他原以為毛澤東可能已同史達林協商過此事，沒有想到這只是毛澤東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對此毫不知情。蘇聯大使在電報中要求莫斯科儘快提出對中國出兵問題的看法，以便日後答覆金日成。²⁷史達林對此一直沒有回答。他說過，中國出兵的條件是「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如果靠蘇聯的援助金日成就可以取勝，何必要中國插手？如果此時中國出兵，蘇聯還如何控制朝鮮以實現其發動戰爭的目標？看起來，不到危急時刻，莫斯科並不想讓中國軍隊介入戰爭。經過幾次試探後，金日成也明白了史達林的這種考慮。

受到莫斯科立場的影響，朝鮮領導人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到達平壤後，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告訴他：「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即使那些過去曾並肩戰鬥過的「延安派」幹部，由於受到嚴格約束，也從不對他談及戰場的詳細情況。²⁸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瞭解情況的參

²⁷ 什特科夫致史達林電，1950年7月20日，ЦАМО 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л.352-355.

²⁸ 沈志華訪問，〈柴成文口述紀錄〉，2000年9月12日。當時中國駐朝鮮副武官王大綱的回憶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他們瞭解情況只能通過華僑或來自中國的朝鮮族幹部。見 Tsui David, "Did the DPRK and the PRC Sign a Mutual Security Pact?"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謀團，也遭到拒絕。²⁹

然而，8月朝鮮戰事在洛東江陷入僵局，這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³⁰8月19日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P. F. Yudin)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³¹同時，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Lee Sang-jo)，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³²9月初，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東北邊防軍的兵力計畫增加到70萬人，

²⁹ 赴朝參謀團未能及時派出的原因，周恩來在8月26日的軍事會議上說，是出於中國方面自己的考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卷4，頁45-46），但後來他對蘇聯大使說，是朝鮮方面不同意(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с. 52-54)。有當事人證實了後一種說法(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63)。

³⁰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卷1，頁91-92。

³¹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с. 45, 47.

³²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сс. 48-49；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p. 273. 李相朝的回憶證實了這一情況。櫻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前高級幹部（李相朝）戳穿虛構的「金日成神話」〉，《文藝春秋》，卷68期5（1990年4月），頁171-172。

另有補充兵員 20 萬人，同時加強了武器裝備。³³中國這樣做無疑是爲了防備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

金日成當然明白中國領導人的意思，但他必須先徵求莫斯科的意見。8 月 26 日，金日成通過電話向蘇聯大使通報，根據他所掌握的情報，美國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區實施登陸。朝方擬採取必要措施來加強上述地區的防務。當晚，金日成借其秘書文日(Mun Il)之口對什特科夫說：「仍然想提出請中國同志派軍隊援助朝鮮的想法，因爲人民軍目前的前線狀況太困難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對此的意見，並提到他幾次想給史達林寫信。金日成還表示，要把這一問題提交勞動黨政治局討論。看到什特科夫無意談論這個話題，文日連忙改口說，上述問題都是他自作主張說的，金日成並沒有請他談這些問題。什特科夫報告說，最近一個時期，金日成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越來越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來幫助朝鮮。但這次通過文日刺探口風後，金日成未再提起過這一問題。³⁴

在史達林的盤算中，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讓中國軍隊捲入朝鮮事務的，以免失去對朝鮮的控制，或使東亞局勢更加複雜化。因此，在金日成的反覆追問下，史達林明確拒絕了金日成關於提供國際援助的要求。在 8 月 28 日的電報中，史達林首先告訴金日成，「聯共（布）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趕出朝鮮」。接著，又安慰說：「不要因爲在與外國干涉者的鬥爭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勝利有時也會伴隨著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史達林最後答應金日成，「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³⁵直接聽到史達林的意見後，金日成「感到非常高興，多次表示感謝」，並一再強調這封信非常重要，應該向政治局委員傳達。顯然是爲了解脫自己，金日成解釋說：「有些政治局委員情緒不對頭，瞭解這封信的內容

³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 3，頁 247-251。

³⁴ 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 年 8 月 29 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27, лл. 666-669.

³⁵ 史達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 年 8 月 28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5-6, 10-11.

對他們有好處。」³⁶此後，完全領會了史達林意圖的金日成便不再考慮請中國提供援助的問題，而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莫斯科了。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證，朝鮮領導人似乎又增強了信心。既然無法得到中國軍隊的支援，自己又無力撤軍回防，金日成決心儘快結束南方的戰鬥。9月4日，柴成文當面向金日成提到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後者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當柴問到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與此同時，金日成的冒險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一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1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後，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³⁷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朝鮮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召見羅申和蘇聯軍事顧問時不滿地指出，朝鮮很少在軍事問題上向中國提供情報，中國曾嘗試派一些軍事技術幹部去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根據官方公布的消息，周建議，如果朝鮮缺少足夠的預備隊（10萬人），就應該將主力北撤。周恩來還不無用意地指出，由於沒有做長時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現在西方國家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可能參與朝鮮的軍事衝突。「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從這方面講，中國軍隊由南方向東北調動，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最後，周恩來請求把這些意見

³⁶ 什特科夫致史達林電，1950年8月30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12-13.

³⁷ 沈志華訪問，〈柴成文口述紀錄〉，2000年9月12日。李相朝的回憶也證實金日成拒絕撤退。櫻井良子，〈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文藝春秋》，卷68期5，頁171-172。

儘快通知蘇聯政府並給予答覆。³⁸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沒有及時提供軍事情報是不對的，原因在於他們年輕，沒有經驗。至於中國的建議，蘇聯同意立即將人民軍主力北撤，建立起漢城防線。但是，對於周恩來提出的中國出兵的問題，史達林沒有任何回應。³⁹周恩來只好建議金日成集中兵力確保三八線，堅持自力更生和長期作戰的方針。⁴⁰9月21日，劉少奇再次向羅申表示，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在朝鮮占了上風，「中國有義務幫助朝鮮同志」。⁴¹

在向莫斯科提出中國出兵問題同時，周恩來也詢問了朝鮮的意見。9月19日，周恩來召見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Li Chu-yon)，向他講述了前一天與羅申談話的同樣內容，並進一步問，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後，「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要求」。⁴²第二天，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彙報了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並解釋說，中朝之間有過一個約定，即如果敵人在後方登陸，中國人將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接著金日成問什特科夫，應如何答覆中國人。在蘇聯大使一句「無可奉告」的外交辭令後，金日成立即說，中國軍隊很優秀，有作戰經驗，但在大量美國飛機不間斷地狂轟亂炸的環境下，他們將會有何表現也很難說。在場的朝鮮人都隨聲附和說：「如果讓中國軍隊到朝鮮參戰，而沒有空軍為其提供空中掩護，那麼，戰鬥依然會相當艱難。」只有外務相朴憲永明確表示希望中國參戰。因為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對這一問題避而未答」。⁴³

9月21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答覆周恩來的提議。朴憲永、金科奉和朴一禹都認為，朝鮮明顯無法憑藉自身的力量打敗美國人，因而必須請求中國政府派軍隊進入朝鮮。但金日成發言說：「我們所要求的武器，蘇聯都給我們了，我們憑什麼去向中國人求助呢？」他相信，「蘇聯和中

³⁸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л. 123-126;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сс. 106-108.

³⁹ 沈志華編，《朝戰解密文件》，頁 542-545。

⁴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 3，頁 311-312。

⁴¹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3-135,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с. 109-111.

⁴²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1,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 109.

⁴³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5, лл. 86-88.

國是不會允許美國人完全占領朝鮮的」。最後，金日成建議「暫且不要通過關於請求中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而是先給史達林同志寫封信，就是否請求中國軍隊援助的問題諮詢一下他的意見」。金日成強調：「如果不請示蘇聯就擅自請求中國軍隊幫助，蘇聯就可能抱怨說，難道我們用顧問和武器來援助朝鮮還不夠嗎？」還說，如果朝鮮加速組建一支新部隊，就不必求助中國人了。會議沒有通過任何決議。⁴⁴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並失去了聯繫。金日成擔心敵軍會越過三八線，而朝鮮已無法組建新的部隊進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給史達林的信，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同時也起草了給毛澤東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們現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同日夜晚，金日成來了求援信，懇求史達林給予「直接軍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國際志願部隊」。⁴⁵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莫斯科終於為中國軍隊開放了綠燈。10月1日，史達林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史達林還故做神秘地說：「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談。但我並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後將會很高興。」⁴⁶

從10月1日接到史達林的電報到10月19日中國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儘管中間經歷了幾次反覆，但毛澤東力排眾議，在蘇聯明確表示暫不出動空軍援助的情況下，毅然決定中國單獨出兵朝鮮作戰，承擔起一個沒有條約約束的同盟者的責任。⁴⁷在中國出兵的問題上，平壤完全是看莫斯科的臉色行事。在兩

⁴⁴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 ф. 5, оп. 918795, д. 125, лл. 89-91.

⁴⁵ 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金日成致史達林函，1950年9月30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л. 46-49, 41-45.

⁴⁶ 史達林致羅申電，1950年10月1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97-98.

⁴⁷ 關於中國出兵的決策過程和毛澤東的內心思考，詳見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頁161-208、278-300。最新研究見沈志華，〈史達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頁51-65。

個社會主義大哥面前，金日成是否因「延安派」的存在而對中國軍隊入朝感到擔憂，目前尚無證據，但顯而易見的是他更倚重蘇聯。而在史達林看來，在美國出兵，特別是三八線受到威脅以後，保衛朝鮮和社會主義東方戰線的責任，無疑還是要落在中國身上。因此，在以後中朝關於戰略和策略的一系列爭論中，莫斯科基本上都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首先是關於軍隊指揮權的問題。最初，金日成有意接管對入朝作戰的中國志願軍的指揮權，故提出志願軍司令部與他的指揮部合在一起。但志願軍司令彭德懷在 10 月 21 日與金日成見面時，閉口不談統一指揮問題，金日成只得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隨著戰事發展，由於缺乏協調造成種種困難，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11 月初，彭德懷提出兩國軍隊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遭到金日成的反對。11 月中旬，彭德懷又提出一個新方案，即由金日成、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三人領導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與此同時，毛澤東將問題報告到莫斯科，請史達林出面協調。史達林立即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於是，經過金日成赴北京與毛澤東親自討論，遂於 12 月成立了志願軍和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由中方任正職，朝方任副職。1951 年 3 月，參照同樣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儘管對於金日成來講，交出軍隊指揮權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然而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這又是朝鮮與中國結盟時必須面對的事實。

其次是中朝聯軍越過三八線後是否繼續南進的問題。經過兩次戰役後，雖然志願軍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由於制空權完全在美國人手裏，中國軍隊的人員損失，特別是物資和裝備消耗難以為繼，彭德懷主張軍隊暫停留在三八線以北。出於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後再休整。於是，1951 年 1 月 8 日進占漢城後，彭德懷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遭到金日成、蘇聯駐朝大使及駐華軍事顧問的強烈反

對。爲此，1月10日和11日，彭德懷與金日成發生了激烈爭吵，甚至聲稱寧可被撤職、審判、殺頭，也不會改變命令。彭德懷的態度如此強硬，是因爲事前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告知史達林來電稱，爲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金日成萬般無奈，只好同意休整。此事對朝鮮領導人刺激很大，按照蘇聯大使的說法是「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以至戰爭結束後很久，在朝鮮勞動黨內還流傳著一種說法：中國的志願軍似乎不願意在1951年初武裝干涉者遭到失敗時徹底解放朝鮮。⁴⁸

再則是關於朝鮮鐵路管理權的歸屬問題。戰爭開始時，確定的原則是對朝鮮鐵路實行軍事管制，由志願軍總部負責指揮。1951年春天，由於戰爭呈現出長期化趨勢，中朝在鐵路運輸的主要任務方面逐漸出現了分歧。朝方考慮到自身的經濟恢復，要求以運輸經濟物資爲主，中方則關注著戰局的變化，主張首先保障軍事物資的運輸。於是，出現了雙方爭車皮、搶路線的混亂情況，以至造成鐵路阻塞、物資被毀的嚴重局面。朝方在鐵路軍管局外又獨自成立了軍事交通局，還要求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畫及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其他均交由朝方管理。經雙方多次討論，中方做出讓步，同意鐵路行政隸屬朝鮮交通省，中方可派人擔任副職；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任正職，朝方任副職，負責審批運輸計畫；成立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搶修司令部），同樣是中正朝副。在協商中，朝鮮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有疑慮。就在雙方政府準備就此談判並簽訂協議時，又是莫斯科的意見扭轉了局面。史達林來電，明確指出「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中方態度隨即變得強硬起來，再次提出對鐵路仍實行軍事管制的問題。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

⁴⁸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電，1951年9月10日，收入《朝戰解密文件》，頁1022-1026；費德林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5年4月，ЦХСД, ф. 5, оп. 28, л. 314, л. 48.

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不過，莫斯科的強力干預，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最後是朝鮮戰爭的停戰時機問題。1951年5月下旬，中國決定採取「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但金日成表示反對，要求中朝聯軍繼續發動進攻。後經史達林干預，朝鮮方面接受了停戰談判的意見。1952年下半年，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在戰俘處理問題上陷入了僵局。此時，毛澤東主張戰爭應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史達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7月15日，毛澤東向史達林報告了停戰談判的情況，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第二天史達林即覆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9月上旬，史達林把金日成召到莫斯科，當著周恩來和彭德懷的面表明了他支持中國強硬立場的態度。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而毛澤東則著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史達林的支持。⁴⁹

在朝鮮戰爭期間和以後許多年，被中朝雙方大力渲染的「鮮血凝成的友誼」和「唇齒相依」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宣傳。中朝結成同盟關係乃是雙方對他們共同的實際利益考慮的結果，這是他們之間的一致性，也是同盟的基礎。當然，他們各自的利益之間也有很多矛盾存在，並由此產生了重大分歧。但這些矛盾和分歧，既不能讓兩國人民瞭解，更不能讓他們共同的敵人獲知。否則，這一同盟對內就失去了合法性，對外則不再有任何威懾力。不過，隨著國際局勢趨向緩和，平壤的不滿和反抗便漸漸顯示出來了。

⁴⁹ 關於以上幾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和引文出處（除註明者外），見梁鎮三，〈中朝在韓戰期間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0（2003年6月），頁55-98。英譯文見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 9-24.

三、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與中共立場的變化

朝鮮停戰以後，儘管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參戰各方未能就結束戰爭達成一致意見，但是也沒有人想要在東北亞重新挑起武裝衝突了。⁵⁰戰爭的煙硝散去後，朝鮮面臨的經濟恢復和建設的嚴峻局面絲毫不亞於戰爭本身。

據 1954 年 3 月蘇聯駐朝鮮使館根據朝鮮中央統計局資料撰寫的備要報告，在戰爭期間，朝鮮遭受了特別嚴重的損失。人口銳減近 120 萬，造成勞動力嚴重緊缺。直接經濟損失達 4,200 億朝元，有近 9,000 座工業建築、60 萬所住宅、5,000 所學校、1,000 家醫院、263 座劇院和電影院以及數千其他文化生活機關變成廢墟。一些最重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急劇減少：電力生產從 1949 年的 59.24 億度下降到 1953 年的 10.16 億度，相應地，採煤量從 394.3 萬噸減少到 68.8 萬噸，鋼從 14.4 萬噸減少到 0.35 萬噸，水泥從 53.7 萬噸下降到 2.65 萬噸等等。農業損失也很嚴重，除大量農作物被毀外，被宰殺和被掠走的牛羊 10.9 萬頭，豬 13.5 萬頭，毀壞果樹 8.9 萬棵。⁵¹在這種情況下，平壤能夠指望的，還是莫斯科和北京。

爲了幫助朝鮮的經濟恢復和建設，蘇聯和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據蘇聯外交部遠東司的調查報告：蘇聯政府根據 1953 年 9 月 19 日的蘇朝協議，在兩年內向朝鮮提供無償援助 10 億盧布；對戰前和戰爭期間提供的貸款（2.98 億盧布）延長了還貸期(1957-1966)，降低了利率（從 2%降爲 1%）；把戰爭期間的非貿易支付債務（7,288.8 萬盧布）減少了一半。中國對朝鮮的援助力度更大，在 4 年內(1954-1957)提供無償援助 80,000 億元（合 16 億盧布）；從戰爭開始至 1953 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於償付，總計 72,900 億元（合 14.5 億盧布）；在 3 年內負責收養 22,735 名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朝鮮孤兒，並承擔對這

⁵⁰ 關於日內瓦會議的最新解密檔案，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選編（第一集）：1954 年日內瓦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⁵¹ 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編，《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拉祖瓦耶夫關於六·二五戰爭的報告書》（首爾：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2001），頁 34-53。

些兒童進行教育的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31,338人）的全部費用。除以上經濟和文化協議外，根據1953年11月23日簽訂的其他協議，在中國專家的待遇和費用以及朝鮮實習人員和留學生的費用等方面，中國的條件也比蘇聯更具優惠性，以至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建議應效仿中國的做法，減少向朝鮮收取專家費用。⁵²儘管如此，朝鮮對蘇聯和中國的疑慮依然存在，在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甚至還有加重的趨勢。

從1954-1956年，中共和蘇共從外交（主張和平共處）到內政（調整經濟結構）都採取了比較一致的立場，並且希望各國共產黨都能執行這一總方針。⁵³然而，由於面對美國的直接威脅，這一方針在朝鮮卻受到明顯的抵制。蘇聯駐朝使館注意到，在1955年1月31日朝鮮勞動黨通過的關於黨和國家現階段基本任務的指南性文件中，沒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見，致力於和平統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鮮人民」和「消滅南朝鮮親美、親日地主集團」作為實現祖國統一的途徑。⁵⁴金日成對莫斯科新方針的不滿更主要地表現在他的內部談話中：「我們要改變一味模仿蘇聯的做法」，「蘇聯人沒有直接與美國人交戰，他們可能希望與美國人和平共處，但是美國人占據著我們的南部，這是令所有朝鮮人民心痛不已的事」。⁵⁵在1956年初的朝鮮勞動黨黨章草案中，繼續反映出這種傾向，以至蘇聯使館不得不對此提出修改意見：刪除原文中「美國的」和「親美的」以及「從軍事上加強革命民主的基礎」等詞語，以免「授人以柄」，「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勞動黨為自己所確定的任務是帶有軍事性質的」。⁵⁶

在經濟建設方面，朝鮮的核心政策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依靠中蘇的幫助，到1955年初，朝鮮三年計畫所確定的工業總產量目標已提前兩年超額完

⁵² 費德林的調查報告，1953年12月31日，АВПРФ, ф. 0102, оп. 7, д. 47, п. 27, лл. 115-120；《人民日報》，1953年11月24日，第1版。參見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17-00125-01，頁3-14。

⁵³ 詳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82-109。

⁵⁴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年4月6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12-15。

⁵⁵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25-126。

⁵⁶ 蘇茲達列夫致謝爾巴科夫函，1956年3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25。

成，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卻沒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農業方面，戰前的糧食生產完全可以自給，現在超過 30%的農民無法養活自己。為彌補糧食不足，朝鮮不得不大量從中國購進糧食，1953 年 20 萬噸，1954 年 13 萬噸，1955 年預計 17 萬噸。被戰爭破壞的居民住宅到 1954 年底只修復了約 70%，大部份城市居民和 30%的農民還生活在簡易的臨時建築裏。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除了在投資比例上過於偏向重工業外，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則是一味追求國有化和合作化。允許私人貿易和家庭手工業在國家監控下的合理存在，本來是消費品生產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鮮領導人卻在執行徹底消除私有資本的路線上陷入了死胡同。私營企業 1949 年占工業企業的 15%，到 1954 年就縮減到 2.5%以下，1955 年的計畫是降到 1.3%。私營資本在貿易中的比重也從 1949 年的 46.8%降到了 1954 年的 22.8%以下，還有近 90%的私人餐館關門，致使相當大一部份城市居民失去了謀生手段。在農業合作化方面，破壞了農民自願加入的原則。1954 年 1 月確定在農村試行合作化，當年便成立了 10,000 個合作社，迫使 32%的農民加入，造成 1954 年糧食總產量比計劃少收 30 萬噸。政府反而提高了農業實物稅的上繳比例，從 27%（大米）和 23%（其他農作物），統一增加到 50%。為完成收購計畫，各級幹部逼迫農民交糧，採取了包括逮捕在內的鎮壓手段，以至在糧食採購期間出現了農民自殺事件和暴動的危險。⁵⁷

在國家關係方面，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在對敵鬥爭和經濟建設中，「朝鮮同志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陣營的力量」，沒有充分肯定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⁵⁸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特別談到，中朝關係有「不正常現象」。如「志願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裏」；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12 個戰績展廳中只留給中國志願軍戰士一個，而在其餘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

⁵⁷ 上述資料來自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波諾馬廖夫和謝爾巴科夫致蘇共中央函，1955 年 5 月 17 日，庫爾久科夫對蘇聯駐朝使館 1955 年政治報告的簡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33-63, 212-214, 271-279.

⁵⁸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6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12-15.

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志願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待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在這個報告中，第一遠東司代理司長庫爾久科夫(I. F. Kurdiukov)注意到，中國政府在 1952 年召回駐朝大使後，直到 1955 年 1 月都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他的結論是，「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儘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但他們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⁵⁹俄國檔案記載的這個情況，大體不錯。⁶⁰不過，蘇聯使館的情報說金日成當時就有意逐步解除延安派幹部的職務，未免言過其實。從此前幾年朝鮮數次黨內鬥爭的規模和結果看，金日成當時要對付的，不僅是延安派，甚至主要不是延安派。

朝鮮勞動黨是在戰前不久才由四個主要派別聯合組成的，以金日成爲首的游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占據了主導地位；延安派成員則多爲軍事領導幹部，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也很有影響力。還在戰爭期間，那些對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構成威脅的各派領導幹部就開始遭到清洗。矛頭首先指向掌握著軍事實權的延安派幹部。1950 年 12 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罷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和被捕。隨後輪到莫斯科派幹部。1951 年 11 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許哥而因與金日成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雖在蘇聯的干預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職務，但最終還是受審，被迫於 1953 年初自殺。1953 年 8 月，以李承燁(Lee Sung-yob)爲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幹部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美國間諜、破壞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圖顛覆共和國。此案矛頭實際上針對的是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腦人物朴憲永，兩年後，最高法院便以間諜罪判處朴憲永死刑。經過一連串的內部爭鬥，勞動黨內各派終於都歸附金日成麾下，朝鮮停戰後不久形成的新領導班子，不僅增加了游擊隊派的金

⁵⁹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33-63. 另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1 月 27-2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126-127.

⁶⁰ 經查，中國大使倪志亮 1952 年 3 月離任，直到 1955 年 1 月中國政府才任命潘自力爲新大使。關於戰爭紀念館的說法也是真實的，筆者 2006 年到平壤參觀時專門去看過，情況依然如此。

一，還有延安派的金科奉、金昌滿(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朴昌玉(Pak Chang-ok)、朴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朴正愛。⁶¹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壓下暫時消失，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有學者指出，1955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體思想」(Juche)是「源於對抗蘇聯和親近中國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蘇聯的影響」，隨後開展的對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的批判，證明了這一點。相反地，為了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金日成曾指出應「學習中國的整風運動」。⁶²鑒於當時提出新方針並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莫斯科，關於主體思想是源於對抗蘇聯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說這裏有「親近中國」的考量，恐怕不夠準確。實際上從金日成的一貫做法來看，時而倒向莫斯科，時而親近北京，這只是他在兩個大國的夾縫中求得生存和保障利益的手段，但無論哪一邊有可能威脅到他的地位，他都不會忍受的。1956年「八月事件」及其前後發生的事情，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蘇共二十大以後，在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風潮的影響下，朝鮮勞動黨內的不滿情緒再次爆發出來。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蘇聯使館送來的赫魯雪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後，表示將認真貫徹到勞動黨實際工作中。⁶³但蘇聯大使伊萬諾夫(V. I. Ivanov)瞭解的真實情況是，在第二天中央全會學習蘇共二十大的材料時，除了從莫斯科回來的崔庸健做報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Nam Il)和宣傳部副部長李一根

⁶¹ 上述資料詳見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頁260-261；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07-122；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首爾：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頁175-176；金南植、沈之淵編著，《朴憲永路線批判》（首爾：圖書世界出版社，1986），第五章。筆者請余偉民、董潔等人翻譯了這些韓文資料，在此特表謝意。俄國檔案也證實了一些這方面的情況。見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年4月7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33-63.

⁶²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25-126。根據1956年1月18日朝鮮勞動黨〈關於進一步加強與文學藝術領域的反動意識形態作鬥爭〉的決議，朴昌玉被開除出中央常務委員會，朴永彬被撤銷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員職務。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關於朝鮮內部個人崇拜情況的報告，1956年4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57-67.

⁶³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3月19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164-165.

(Li Il'-gen)三人發言。談到個人崇拜問題時，金日成專講南方黨員對朴憲永的崇拜，而對朝鮮勞動黨內嚴重存在的對他個人的崇拜現象，如全國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紀念碑，到處可以看到他的肖像，電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頌他的英明等，卻隻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後在報紙宣傳中不要再突出個人作用了。會上宣讀了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翻譯文本，但沒有進行討論，也沒有做任何決議。⁶⁴會後，勞動黨中央向各機關發下了關於學習蘇共二十大的秘密文件，其中的基調是勞動黨在各方面都「始終堅持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並多次強調集體領導是黨的最高原則，「勞動黨中央從未放棄這一原則」。至於黨內的個人崇拜問題，只是以前曾經有過，且只與朴憲永有關。⁶⁵

1956年4月23-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目的是進行人事調整，進一步消除反對派的勢力和影響。會議既沒有討論人們議論紛紛的黨內個人崇拜問題，也沒有消除前一段廣大幹部對人事處理的不滿情緒，甚至也沒有研究人民普遍關心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問題。金日成的長篇報告，除了讚揚朝鮮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成就外，就是反覆批判朴憲永等南方派領導人以及其他「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至於蘇共二十大路線和集體領導問題，報告中既沒有讚揚，也沒有反對。很多人要求在大會發言，都被拒絕——因為知道他們要說什麼。大會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以保證對金日成的忠誠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上屆保留下來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保留的只有2人，⁶⁶以至於會議期間，在報紙和發言中對金日成的頌揚反而愈演愈烈，令蘇聯外交部感到「很不正常」。⁶⁷在貫徹代表大會精神的平壤市委積極分子會議上，積極追隨金日成

⁶⁴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3月21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1, лл. 165-168.

⁶⁵ 伊萬諾夫致費德林函，1956年4月1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37-139.

⁶⁶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л. 1-17；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28-130；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20-222；伊萬諾夫與金承化會談紀要，1956年5月24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07-211。

⁶⁷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6年4月29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63-170.

的勞動黨副委員長金昌滿的表現可為例證。金昌滿在高度評價了代表大會的意義後指出：「我們黨內沒有個人崇拜現象」，過去出現過的，就是「在南方對朴憲永的個人崇拜，在北方對許哥而的個人崇拜」。同時警告大家，「關於現在我們黨存在個人崇拜的言論不僅不能鞏固、反而只會削弱我們黨。因此，誰要發表這樣的言論就處分誰。」⁶⁸

這次會議的人事調整主要是針對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會之前一次審議候選人的中央會議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從蘇聯回來的幹部已經接受了朝鮮國籍，又不願放棄蘇聯國籍，為什麼還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對此，崔庸健憤怒地說道，既然他們腳踏兩隻船，就應該把他們踢出去。結果，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在代表大會後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金日成又針對莫斯科派幹部經常光顧蘇聯使館的情況，特別強調了保守機密和加強紀律的問題，並規定從即刻開始，與外國人的一切聯繫必須通過外交部和外貿部進行。這一時期，鬥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的，因此對延安派顯得十分寬容。也是在這次常委會議上，金日成突然主動提出了朴一禹的問題，他通報了有關朴一禹案件的調查情況後指出，調查結果尚不能確定其所犯罪行的具體內容。於是，金科奉和金光俠均表示應立即釋放朴一禹，但崔庸健仍堅持應當槍斃，南日也認為朴必須受到懲罰。最後，金日成決定：朴一禹理應予以釋放，但目前暫不執行。⁶⁹對於延安派幹部李相朝的問題，金日成也沒有追究。李在戰爭初期曾作為金日成的代表駐在北京，這次是從駐蘇大使任上特意回國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會議期間，他曾兩次給主席團寫便條，建議討論勞動黨內部存在的個人崇拜問題。李提的建議非但沒人理睬，還被金昌滿叫去責罵了一頓。崔庸健、朴金哲(Pak Kym-cher)等人甚至主張撤銷其大使的職務。後來金科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見，風波才算平息。⁷⁰

金日成對延安派採取如此寬容的態度，顯然是因為他知道在排擠莫斯科派

⁶⁸ 費拉托夫與朴澤燮會談紀要，1956年5月2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02-203.

⁶⁹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5月10日、1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 227-229; д. 410, лл. 174-177.

⁷⁰ 薩姆索諾夫與金善福會談紀要，1956年5月31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2-223.

的問題上，與蘇聯的矛盾是無法迴避的。在二十大前，蘇聯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鮮勞動黨內對金日成個人崇拜的種種表現，並建議蘇共中央提請金日成注意改正。⁷¹而現在，蘇聯外交部所屬情報委員會還特別注意到，不久前對莫斯科派領導幹部的嚴厲處罰，與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個人崇拜問題有關。因此，委員會建議蘇共中央對勞動黨進行幫助。⁷²外交部遠東司則認為，對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實際上是發起了一場旨在反對所有蘇聯朝鮮族人的運動」。⁷³1955年底，在朝鮮共有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幹部 136 人，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 1955 年 12 月 31 日法令，他們必須確認一個國籍。在回答徵詢問卷時，當時多數人表示願意加入朝鮮國籍，只有 24 人提出在加入朝鮮國籍後，還想保留蘇聯國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職後，面對勞動黨對莫斯科派幹部的排擠和歧視，很多人感到後悔，有人（如建設相、人民軍衛生部部長等）甚至偷偷到蘇聯使館要求保留或恢復蘇聯國籍。⁷⁴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於 1956 年 5 月 30 日約見了蘇聯副外長費德林(N. T. Fedorenko)。在通報了金日成將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以求經濟援助的情況後，李相朝詳細報告了勞動黨內的不正常情況，並強調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實際上籠罩著整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缺乏集體領導，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個人決定。對金日成的吹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朝鮮人民革命博物館變成了金日成個人事業的歷史博物館」，甚至傳說「金日成在兒童時代就已經開始領導朝鮮人民進行反抗日本的解放鬥爭了」。李相朝還指出了金日成在經濟工作和使用幹部方面及戰爭期間的種種錯誤，並多次強調，蘇共中央必須儘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幫助勞動黨，特別是幫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險的錯誤。⁷⁵

⁷¹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5 年 4 月 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л. 33-63.

⁷² 蘇聯外交部情報委員會關於朝鮮內部個人崇拜情況的報告，1956 年 4 月 5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57-67.

⁷³ 庫爾久科夫致波諾馬廖夫函，1956 年 4 月 29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163-170.

⁷⁴ 庫爾久科夫對蘇聯使館 1955 年政治報告的簡介，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271-279；伊萬諾夫日記，1956 年 5 月 7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22-224.

⁷⁵ 費德林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 年 5 月 30 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190-196.

在不久後的另一次會談中，李相朝還建議，蘇聯領導人與金日成會談時，最好要求朝鮮代表團的成員都參加，這樣效果會好一些。否則，勞動黨內不會聽到蘇聯的意見。⁷⁶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單獨約見了蘇聯大使。崔全面報告了朝鮮最近的情況，特別是在幹部使用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黨內領導幹部的任用既沒有照顧到來自國內、中國和蘇聯等各個方面的幹部，更不是任人唯賢，提拔的都是那些沒有文化、沒有經驗卻專門會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人，這也是造成嚴重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樣強烈要求蘇共中央幫助改變這種狀況，並希望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議。崔說，對於蘇聯的建議，金日成一般都會認真對待的。⁷⁷

關於金日成訪蘇期間與蘇聯領導人談話的情況，目前沒有詳細資料。只知金曾受到赫魯雪夫的接見，會談中蘇聯領導人對他提出了一些意見，但因有些情況不明，委託中央聯絡部弄清楚。金日成則表示接受批評，以後注意改正錯誤。事後，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報了談話結果，毛澤東認為蘇共這樣做很好。⁷⁸8月2日，蘇共中央又通過使館向勞動黨傳達進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評勞動黨的一些錯誤做法時應表現得主動一些。⁷⁹對於金日成排除異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來是表示過不同意見的。⁸⁰蘇共二十大前後朝鮮勞動黨打擊莫斯科派幹部和繼續大搞個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是可以想見的。所以，勞動黨內的反對派寄望於從外部對金日成施加壓力，莫斯科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在八月全會發起反對金日成的進攻，起了刺激和鼓勵的作用。

⁷⁶ 庫爾久科夫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年6月16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38-241.

⁷⁷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6月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10-214.

⁷⁸ 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錄，1956年9月18日。凡未註明出處者為筆者個人收藏的檔案，下同。

⁷⁹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6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35-337.

⁸⁰ 例如，武亭被撤職後回到了中國，由此躲過審判。參見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07-109。據蘇聯方面的情報，朴一禹被排擠引起了中國軍方的不滿。（波諾馬廖夫和謝爾巴科夫致蘇共中央函，1955年5月17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14, л. 212-214.）1953年11月，金日成到北京時，毛澤東提醒他無論如何不能殺朴憲永，蘇聯也通過顧問向金日成建議不要殺人，但金不予理睬。後來蘇聯大使問起此事，金十分不滿，甚至與其發生了爭執。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錄，1956年9月18日；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4月19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2, лл. 214-216.

據俄國檔案反映的情況，在朝鮮勞動黨三大期間及以後，金料奉、崔昌益、朴昌玉、朴義琬(Pak I-van)、徐輝、尹公欽、金承化(Kim Cyn-khva)等一批領導幹部對黨內的個人崇拜狀況、幹部政策和經濟方針感到不滿，特別是金日成出訪期間在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更加強了這種對立情緒。他們希望在8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揭露和批評這些錯誤。8月初金日成回國會後瞭解到這種情況，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愛等人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評，同時指責這些反對派人物對抗黨的方針並煽動不滿情緒是「反黨」行爲，以無能、獻媚和歷史問題爲由，堅決要求撤換金日成身邊的一批領導幹部是「宗派」和「分裂」活動，他們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其結果將破壞黨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險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別地、反覆地找一些有不滿情緒的幹部談話，採取威脅、利誘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對派隊伍，如說服金料奉放棄撤換幹部的主張，迫使朴義琬採取中立立場，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學習等。此外，還使用警察手段監視反對派幹部，對他們的司機、保姆進行審問，並急召出訪的內務相方學世(Pan Khak-se)回國佈置防範措施等等。

經過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動權。蘇聯使館的態度令他滿意：除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對勞動黨的錯誤採取主動姿態，並不得打擊報復提意見的幹部外，伊萬諾夫明確表示，召開中央全會的目的是鞏固勞動黨的領導地位，維護黨內團結，爲此同意金日成先召開中央常委會議統一思想。這實際上就表明，蘇聯不同意反對派關於撤換一批領導幹部的核心主張。蘇聯還表明了不干預朝鮮勞動黨內部事務的基本立場，這更讓金日成感到放心。於是，在8月21-23日召開的常委會議上，雖有一些不同意見發表，但最後的結論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犯錯誤的主要是許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對此「中央常務委員會將採取措施來予以清除」；根據目前調查的材料，沒有理由對黨的領導幹部進行撤換。金料奉謹慎和退縮的發言，是金日成能夠把握這次會議方向的關鍵因素。8月28日，常委會議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上做的報告草案。

報告包括代表團出訪的結果、朝鮮國內的形勢和勞動黨的狀況及任務三個內容，基調同以前一樣。報告沒有涉及黨內紀律問題，只說可以在全會討論，但在結尾處，金日成提出黨內「存在著派別和宗派活動殘餘」，號召全黨加強警惕並與之鬥爭。⁸¹

8月30-31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金日成按照預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會一致通過的報告，隨後的兩個發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讚美之詞。第三個發言的是延安派幹部、貿易相尹公欽，他以「憤怒的揭發式語調」批評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尹的發言被多次打斷，並淹沒在一片反對聲中，崔庸健甚至站起來大罵，會場一度陷入混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為尹公欽辯護，但沒有得到講話機會。面對如此局面，中午休會的時候，尹公欽與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Kim Gan)、建材局長李弼奎(Li Pkhir-giu)悄悄離開會場，潛往中國。在以後的會議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贊同尹公欽的意見，幾乎所有的發言都指責這種「反革命和反黨」言論，並對上述幾人的「錯誤」或「罪行」展開了猛烈抨擊，崔昌益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首領和思想家。第二天的會議做出決議：由於「從事反黨活動」，開除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四人的黨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職務，解除朴昌玉內閣副首相和中央委員的職務，上述問題均移交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審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東海岸一個小型鋸木廠去當廠長，而崔昌益則被任命去負責一個養豬場的工作。會後，「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強力鎮壓之中」，很多黨內重大問題遭到歪曲，呈現在全體黨員群眾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滿的人策劃了宮廷政變式的嚴重密謀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蘇聯使館，崔庸健到中國使館，分別通報了全會情況和所做決議。⁸²

9月3日，朝鮮政府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有4名朝鮮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並被中國邊防軍截獲，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人等遣返回國。喬曉

⁸¹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6-29日、9月1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0，лл. 335-359，317-321.

⁸²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1、4、6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0，лл. 319-321，322-325，327-332；謝斯捷利科夫日記，1956年9月14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2，лл. 302-303.

光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當場答覆：這些人並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喬將這一情況向伊萬諾夫做了通報，並詢問蘇聯的看法。⁸³顯然，中國政府此前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立場，而莫斯科的態度就比較謹慎了。

9月5日，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求見費德林並提交了他給赫魯雪夫的信。李指責金日成對提意見的同志實行鎮壓，請求蘇共中央干預此事。還說，外務省已經兩次召他回國，他聲稱有病，還未成行。⁸⁴9月6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朝鮮問題。會議決定，委託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經過「周全的考慮」後接見李相朝，並答覆中國大使，蘇共中央將委託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交換意見。⁸⁵在9月10日與李相朝會談時，波諾馬廖夫答覆：蘇共對朝鮮發生的事情表示憂慮，蘇共代表團將與同樣在中國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和中共商談此事，但不會干預其內部事務。對於李請求蘇共公開發表批評勞動黨的言論的建議，波諾馬廖夫拒絕討論。⁸⁶其實，莫斯科的這種立場並不是在事件發生後才突然形成的。由於赫魯雪夫的那份秘密報告在蘇聯國內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引起的震動和混亂，加上中共中央4月5日文章的公開表態，使得蘇共在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變得謹慎起來，甚至對那些比較激烈的批判言論採取了壓制的做法，蘇共中央6月20日的決議充分表明了這一點。⁸⁷在後來與金日成的會談和通信中，蘇聯領導人透露了這些情況，並表現出對繼續批判個人崇拜的謹慎態度。金日成立即在黨內傳達了這些資訊。⁸⁸應該說，蘇聯態度的轉變，無疑是金日

⁸³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4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322-325.

⁸⁴ 費德林與李相朝會談紀要，1956年9月5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4-228。在蘇聯養病的郵電相也不敢回國，因為一旦回去就會被捕。見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錄，1956年9月18日。

⁸⁵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30,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сс. 166-167.

⁸⁶ 波諾馬廖夫關於李相朝會談情況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8-232。

⁸⁷ 詳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史達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收入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1輯，頁28-70。蘇共中央決議見《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

⁸⁸ 波諾馬廖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10, лл. 228-232.

成敢於採取嚴厲措施處理黨內問題的因素之一。

爲了平息黨內的不滿情緒，同時也爭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會後，立即對在此前受到打壓的莫斯科派幹部採取了懷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愛召集從蘇聯返回的朝鮮幹部開會，出席者約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幹部的2/3）。會議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將改變對來自蘇聯的朝鮮幹部的態度，並爲他們平反。⁸⁹箇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爲這次鬥爭的主要矛頭已經轉向延安派了。從金日成等人向蘇聯報告的情況看，與八月「反黨」事件有牽連的，主要是延安派幹部，不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動主謀的崔昌益和徐輝，就連反對派中的最高層幹部、黨內元老（「老頭子」）金料奉，都是陸續從中國回來的。據說，金日成曾講過這樣的話：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屬於延安派。⁹⁰因此，金日成才會改變對莫斯科派的態度，目的是集中對付來自北京的壓力。

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與蘇共代表團商談了處理朝鮮問題的意見。蘇共代表米高揚(A. I. Mikoyan)說，昨天他與朝鮮代表團談話，批評了他們，但崔庸健不服氣。還說，蘇共對情況不太瞭解，還沒有肯定的意見，建議中蘇兩黨共同派人去平壤，瞭解情況。毛澤東在談話中則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爲不滿，並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史達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與米高揚「瞭解情況」的建議不同，毛澤東提出，中蘇兩黨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毛澤東說，「我們要對金日成說，我們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幫助你，但是你必須改正錯誤」，「我們也要勸那些被整的人採取和解態度，勸雙方和解」。具體方法是召開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中蘇代表參加；會議要做出決議，還要公開發表。毛澤東還對米高揚說，金日成對我們有情緒，不聽中國的，這次主要靠你們了。米高揚沒有明確表示意見，只說去談談看。中共希望這次去就要解決問題，但米高揚推說國內還有

⁸⁹ 謝斯捷利科夫日記，1956年9月14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2，лл. 302-303.

⁹⁰ 徐大肅，《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頁131-133。

事情，不能過多停留。⁹¹接著，中共領導人又與朝鮮代表團舉行了會談。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並通知他們，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毛還說，對於朝鮮勞動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應該打，後來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後方登陸。國防部長彭德懷和情報部長李克農甚至質問：朝鮮戰爭到底是誰發動的？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還是你們發動的？會談中對朝鮮人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毛最後說，我們可以叫跑到中國來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復他們的黨籍和職務，把問題拿到黨的會議上冷靜地加以解決。⁹²顯然，中共的態度更加明確，不過，除了要求金日成糾正錯誤外，並沒有進一步的企圖。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後，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原則上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9月2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做出決議，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米高揚回到中國後表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澤東指出：「問題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的確，正如蘇聯大使伊萬諾夫所說，實際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決議的，而九月全會通過的決議，也是「兄弟黨對朝鮮勞動黨領導人施加影響的結果」。因此，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後，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在媒體公布九月全會決議（只在黨內傳達並在報紙上發了一個簡短消息），反而繼續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此外，關於釋放朴一禹的協議遲遲沒有結果，答應恢復尹公欽等人家屬糧食供應的諾言也一直沒有履行。儘管中國一再表示對於是否執行這些協議的結果非常關心，但朝鮮方面一直虛

⁹¹ 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紀錄，1956年9月18日。

⁹² 毛澤東接見朝鮮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18日。

與委蛇，拖延不辦。⁹³後來，波蘭和匈牙利爆發危機，莫斯科和北京都去關注歐洲的問題，朝鮮的事情便暫時擱置下來。

四、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與中朝關係的改善

在中朝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金日成進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攏的步伐。借著蘇聯出兵匈牙利的舉動，1956年11月2日南日向蘇聯大使表示，朝鮮「今後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我們認為現在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⁹⁴在朝鮮新大使李新八(Li Sin-pkhar)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對他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繫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⁹⁵此外，爲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布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係。如中國副外長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中國人說，蘇聯承認在對波蘭問題的看法上犯了錯誤；李相朝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等。⁹⁶對於這些情況，北京未必一無所知，但卻沒有做出進一步反應。因爲，這時中國看問題的角度也出現了很大變化。

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及蘇共二十大路線的看法逐步發生了轉變，認爲蘇聯放棄階級鬥爭、與美國實現緩和的方針是錯誤的，並由此表露出對蘇共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和地位產生了懷疑，特別是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後，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漸擴大。⁹⁷

爲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中共不得不對朝鮮採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針。

⁹³ 詳見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紀錄，1956年9月23日。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86，л. 1-17；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0月1、8、26日，11月22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86，л. 26, 28-33；д. 412，л. 344-347；д. 411，лл. 295-296。

⁹⁴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2，лл. 364-365。

⁹⁵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28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1，лл. 297-300。

⁹⁶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11月9、28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11，лл. 292-294, 297-300。

⁹⁷ 詳見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頁75-89；〈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82-109。

這首先反映在中國對流亡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上，中國地方檔案中有這樣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長春的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前組織部長金忠植(Kim Chyn-sik)寫信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請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並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⁹⁸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金忠植談話時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嚴肅地告訴他：中朝兩黨和兩國關係一向友好，中國也「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託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⁹⁹6月28日，在吉林避難的前朝鮮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金俊根(Li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寫信給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國參加一定的組織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聯絡部答覆吉林省委：「告訴他們，我們沒有這樣合適的組織給他們參加。至於幫助他們自學的問題，請你們就近指定一適當的同志，幫助他們自學。」¹⁰⁰

的確，此時的中朝關係有了迅速好轉的趨勢。八月事件前後，中國政府對於朝鮮提出在1957年給予額外無償援助或5,000萬元貸款的請求，一直沒有回應，最後乾脆予以拒絕。因此，朝鮮也取消了預定以副首相金一為首的經濟代表團訪華的安排。¹⁰¹而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為了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鮮勞動黨中央經濟代表團訪華，與中方商討朝鮮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指標和援助問題，中國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準備和安排。¹⁰²10月25日，志願軍入朝作戰七周年時，中朝關係的升溫最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願軍司令員楊勇上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而毛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

⁹⁸ 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1-13/1-1957.41，張174。

⁹⁹ 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1-13/1-1957.41，張169。

¹⁰⁰ 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1-13/1-1957.41，張183-184。

¹⁰¹ 伊萬諾夫關於朝鮮局勢的報告，1956年12月28日，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86, лл. 1-17.

¹⁰²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17-00665-03，頁5-24。

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並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後的十月革命紀念日，據《人民日報》報導，「志願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¹⁰³

在這樣的氣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在會談中強調朝鮮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並向毛澤東詳細講述了「八月事件」陰謀顛覆朝鮮政權的性質，取得了毛的認可。回國後，金日成立即採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擊的金科奉這次也沒有逃脫噩運，先是被開除黨籍，而後遭到拘禁，最後被送往順安農場進行勞動改造。隨後被肅清的，不僅有延安派幹部，還有對金日成不滿的其他派系的領導幹部金元鳳(Kin Von-bon)、趙素昂(Cho Sou-ang)等。¹⁰⁴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餘毒素」。這份資料在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臺，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¹⁰⁵這一切自然是中朝關係改善的結果。此時，中共對勞動黨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變。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稱讚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簽了字，是反帝國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還說，1956年中國和蘇聯派人去朝鮮解決人家的內部問題，用意是好的，但結果不好，方式不對。周恩來在1958年2月訪朝回國後也說，從朝鮮跑過來的那些人反映的情況很片面，導致中國對朝鮮產生了錯誤看法。¹⁰⁶《人民日報》還摘要刊登了朴金哲在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有一段是專門點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黨宗派」的。¹⁰⁷

爲了安撫金日成，進一步鞏固中朝關係，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¹⁰³ 《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5、26、30日，11月9日。

¹⁰⁴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сс. 960-961；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頁178-179；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頁262-263。

¹⁰⁵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204-00612-01，頁28-39。

¹⁰⁶ 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1-14/1-1958.94，張106-108。

¹⁰⁷ 《人民日報》，1958年3月9日，第3版。

即撤回在朝鮮的全部志願軍部隊。就社會主義陣營一方來說，停戰後的朝鮮問題主要由中國出面解決。中朝關係緊張以後，雙方對解決朝鮮問題的方式和途徑產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擺脫北京對這一問題的控制。1956年11月，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備忘錄，提出讓聯合國出面協助解決朝鮮問題。中國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個建議違反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蘇、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則。在徵求了莫斯科的意見後，中國政府在12月8日的回電中指出，聯合國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參戰的一方，而且聯合國只承認南朝鮮政府，故沒有資格出面協調；目前「全面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條件還不成熟」，為此「需要經歷長期的鬥爭」。同時，中國政府還遇到了一個更棘手的問題。針對志願軍幹部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事件，有朝鮮公民甚至領導人把志願軍看成是占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¹⁰⁸正是因為瞭解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56年9月與米高揚會談時就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國撤軍——儘管蘇聯人對此表示懷疑。¹⁰⁹

朝鮮停戰以後，部份中國軍隊便陸續撤退回國。1954年9月撤回7個師，1955年3月撤回6個師，到1956年4月在朝鮮的志願軍部隊還有44萬人。¹¹⁰在中國和蘇聯看來，志願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美國在南朝鮮駐軍的主要力量。雖然1956年4月中國政府發出呼籲，要求各方向時從朝鮮撤軍，但是正如中國在向蘇聯通報時承認的，這個建議只不過是為了減輕來自中立國方面的壓力，是對美國企圖取消中立國委員會主張的回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1957年1月周恩來訪蘇前夕，考慮到中國的立場，蘇聯外交部對朝鮮問題的既定方針進行了討論，認為應該強調，在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願軍繼續

¹⁰⁸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度報告，1957年4月18日，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03, л. 409, л. 139-143；新華社編，《內部參考》，第2073號，1956年12月8日，頁158-163；第2111號，1957年1月22日，頁427-429。

¹⁰⁹ 毛澤東與米高揚談話紀錄，1956年9月18日。

¹¹⁰ 《人民日報》，1954年9月9日，第1版，1955年3月26日，第1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2。

駐紮的朝鮮，「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¹¹¹然而，到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的主張就完全改變了。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與金日成談話，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並指出現在形勢大好，「東風壓倒西風」，美國不敢妄動。這個建議令金日成感到驚訝，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認為如同毛澤東所說，這樣做可以給美國施加壓力。金日成回國後立即召集會議討論，隨即兩次給毛澤東發電，表示勞動黨中央贊成志願軍回國，並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最後雙方商定，朝鮮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要求雙方撤兵，中國政府再表示響應和支持，然後開始單方面撤軍，至 1958 年底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1958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了這一情況。¹¹²1 月 16 日蘇聯外交部答覆，這一舉動「非常英明」。¹¹³於是，2 月 5 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實現全朝鮮自由選舉，實現南北朝鮮和平統一的目標。2 月 7 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響應朝鮮的和平倡議，準備同朝鮮協商撤出志願軍，要求美國和其他有關各國也採取措施，從南朝鮮撤軍。不久，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支持這一建議。¹¹⁴

2 月 14 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朝鮮，商討撤軍的具體步驟和其他事宜。雙方確定，從 3 月至年底，計畫分三批實現全部撤軍，並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朝鮮問題應由朝鮮內部通過談判解決，無需外國干涉。此後，第一批部隊 6 個師共 8 萬人，從 3 月 15 日至 4 月 25 日撤出；第二批 6 個師及其他特種部隊共 10 萬人，從 7 月 11 日至 8 月 14 日撤出；第三批志願軍總部、3 個師和後勤部隊共 7 萬人，從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6 日撤出。志願軍撤退時，

¹¹¹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 1956 年度報告，1957 年 4 月 18 日，АВПРФ, ф. 5, оп. 28, п. 103, д. 409, лл. 139-143；謝皮洛夫呈蘇共中央的請示，1957 年 1 月 4 日，收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未刊），卷 11，頁 2810-2813。

¹¹²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9-00828-01，頁 4-7；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 1957 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 年第 4 期（總第 96 輯），頁 30。

¹¹³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9-01813-01，頁 1-2。

¹¹⁴ 《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6 日，第 1 版；2 月 7 日第 1 版，2 月 22 日，第 5 版。

將營房、設備和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¹¹⁵至此，在朝鮮作戰和駐守 8 年之久的中國軍隊，終於全部撤退回國，此舉無疑進一步加強了中朝之間的友好關係。¹¹⁶

無論如何，到 1958 年底，在朝鮮形成了金日成一統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陰影也雲消霧散，中朝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五、金日成左右逢源與《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

1958 年，中蘇之間在對內和對外政策層面的重大分歧，開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炮擊金門的問題上顯現出來。1959-1960 年，赫魯雪夫撕毀核子武器援助協定，中蘇領導人當面發生激烈爭吵，中共在世界工聯會議向蘇共的理論和方針提出公開挑戰，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的圍攻，特別是蘇聯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華專家，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中蘇同盟開始走向破裂。¹¹⁷顯然，在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鬥爭中，中蘇兩黨都需要爭取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黨的支持，其中當然包括朝鮮勞動黨在內。

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是在面臨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所造成的艱困條件下進行的。1960 年 10 月，中朝簽署了貸款協定、延期還款換文及供應成套設備和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李周淵副首相對此深表感激說：「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誼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¹¹⁸金日成後來稱讚說，朝鮮七年計畫的前期將有重點地發展手工業和輕

¹¹⁵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卷，頁 1370-1370；《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21 日，第 1 版；1958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安東諾夫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1958 年 7 月 26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5, лл. 1-75。

¹¹⁶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和分析辦公室當時全面分析了中國撤軍的動機，然而所談 4 個原因，沒有一個說到問題的實質。見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March 17, 1958, MF2510409-007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¹¹⁷ 詳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222-295。

¹¹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355-356；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204-00432-01，頁 1-3；《人民日報》1960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工業，而中國援助的 18 個工廠都是輕工業，這些工廠投入生產後幫助朝鮮解決了很大問題。¹¹⁹此外，中國領導人從自身與蘇聯交往的感受出發，在處理雙邊關係時，比較注意朝鮮方面的民族感情。1959 年 2 月 13 日，毛澤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整理的一個對外關係材料中特意加了一句話：「過去有些同志對朝鮮同志看缺點較多，看成績較少，犯了片面看問題的錯誤。」¹²⁰對於 1960 年 10 月中朝兩國足球賽中發生群眾噓朝鮮裁判事件，周恩來專門對國家體委有關部門提出批評，還指示要向群眾進行深入教育。¹²¹還有，對於朝鮮報刊刪改中方國慶稿件一事，中國也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¹²²最重要的是，中國採取的對美強硬立場，比之莫斯科的緩和路線，更加符合平壤的需要。1960 年 5 月赫魯雪夫熱中的四國首腦會議流產，在世界上引起震動，時局驟然緊張起來。金日成特意跑到杭州來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抱怨說，赫魯雪夫 1955 年就叫他們不要反對美帝國主義。¹²³這恐怕是朝鮮面對中蘇分歧而表現出對華友好和親近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中蘇之間發生分歧的各個方面，朝鮮都採取了或明或暗支持中國的態度。例如，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與蘇聯的中立立場不同，朝鮮各報公開表示支援中國，指責衝突的責任在印度一方，要求按照中國的方案解決問題。¹²⁴對於中國的「大躍進」和經濟建設總路線，朝鮮也是一貫持讚揚態度，認為中國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中共和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結果。¹²⁵甚至到 1961 年中國經濟已陷入困境，朝鮮領導人仍然堅持認為中國的路線和政策是正確的，並表示支持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¹²⁶特別是在 1960 年 11 月的莫斯科會議上，中蘇兩黨雖然有意緩和雙邊關係，但又都各持己見，於是發生了激烈爭論。無論是在

¹¹⁹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頁 201-01451-01，1-12。

¹²⁰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冊 8，頁 41-43。

¹²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371。

¹²²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16-00498-07，頁 51。

¹²³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 1075-1076。

¹²⁴ 《人民日報》，1959 年 9 月 14 日，第 3 版；11 月 27 日，第 5 版。

¹²⁵ 《人民日報》1960 年 1 月 25 日，第 6 版。

¹²⁶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6-00577-04，頁 60-61、62-63。

討論宣言草案的預備會上，還是在正式會議的發言中，朝鮮與阿爾巴尼亞、越南、日本等國代表都公開支持中共的觀點，並從各自的角度批評了蘇共的觀點和做法。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達成基本一致的意見，除了中蘇雙方抱有和解的態度外，朝鮮等國代表明顯地站在中國一邊，因而避免了如布加勒斯特會議時中共受到集體圍攻的局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¹²⁷

莫斯科會議前後，朝鮮對華友好的態度更加明朗，在國際政治鬥爭中也更加趨向於同中國密切配合，一致行動。如再次掀起的反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樹立主體思想的運動，其教育和宣傳的內容主要是反對盲目學習蘇聯，照搬蘇聯的經驗，並轉而提倡向中國學習，發揚自己的特點。同時，在報刊上大力強調反對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指出修正主義是當前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要危險。¹²⁸在此基礎上，中朝之間在外交領域的配合行動更加緊密。1961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邀請南北朝鮮代表參加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議案，朝鮮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慮到1956年中朝曾在這一問題上發生分歧（見前文），故事前徵求中國的意見。中國政府表示原則同意朝鮮的立場，但也明確提出三點修改意見。朝方對此表示感謝，並按照中方意見修改了外務省的聲明稿。¹²⁹中朝之間的友好合作，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朝鮮也注意保持同蘇聯的友好關係。莫斯科的吸引力主要在經濟方面，而蘇聯的經濟實力和援助力度一般都大於中國。1959年3月17日，蘇朝簽訂了新的經濟合作協定。爲此，蘇聯將向朝鮮提供價值5億盧布的各種機器設備和技術幫助，以協助建設一座二十萬瓩的火力發電站、化工廠、麻紡廠和毛織廠，以及擴建金策製鐵所和平壤絲織廠。1960年10月，蘇朝簽署協定，免除朝鮮政府償還所欠總數7.6億盧布的貸款。12月24日，蘇朝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貿易兩個協定，蘇聯將幫助朝鮮新建和擴建鋼鐵廠、火電站和煉

¹²⁷ 關於這次會議的研究，詳見李丹慧，〈最後的努力：中蘇在1960年代初的鬥爭與調和〉，《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頁132-162。

¹²⁸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6-00579-03，頁124-135；109-03052-06，頁8-21。

¹²⁹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6-01361-03，頁41-42、48、49、51-53。

油廠，並計劃在今後 5 年中將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增加 80%。¹³⁰1961 年 5-6 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柯西金(A. N. Kosygin)訪朝，把蘇朝關係推向高潮。¹³¹在這樣的背景下，便出現了朝鮮與蘇聯和中國同時簽訂友好條約的情況。

柯西金回國後，6 月 24 日朝方公布了金日成將率領黨政代表團訪蘇的消息，26 日朝外相約見中方喬曉光大使，主動介紹了朝蘇準備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情況。蘇朝簽訂條約是 1959 年就談好的，後來因赫魯雪夫訪朝推遲而耽擱下來。鑒於中方此前也有意與朝簽約，喬就此機會談到中朝兩國締約的必要性。28 日金日成即約見喬曉光，表示朝方完全贊成締約，「而且時間越快越好」，並主動提出在訪蘇後逕往北京簽約。第二天中方便通知朝鮮，熱烈歡迎金日成訪蘇後於 7 月 10 日訪華，並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¹³²隨後，朝方將蘇朝條約的草案交給中方，並建議條約和公報均由中方提出，雙方商量。¹³³中國在對金日成訪華的接待和宣傳工作進行周密安排的同時，參照蘇朝條約和中蘇條約，起草了中朝條約。條約規定了中朝兩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全面合作互助的關係，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軍事同盟性質」。¹³⁴對於中方起草的聯合公報，朝方也完全同意，只是要求增加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讚揚和對朝鮮援助的感謝等內容。¹³⁵

7 月 10-15 日，金日成在中國受到熱烈和隆重的歡迎，雙方對這次訪問都十分滿意。周恩來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以法律的形式把我們兩國人民用鮮血結成的戰鬥友誼加以肯定」，金日成則指出：條約為兩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所培養出的兄弟友誼和同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¹³⁶

¹³⁰ 《人民日報》，1959 年 3 月 19 日，第 4 版；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盛曾安等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1946-60 年代初）》（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卷 6，頁 6728；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9-03052-06，頁 8-21。

¹³¹ 詳見《人民日報》，1961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

¹³²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14-00206-01，頁 16-21、1-2。

¹³³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14-00206-01，頁 3-5；204-00765-03，頁 27-28。

¹³⁴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201-00761-05，頁 54-57；114-00206-01，頁 16-21。蘇朝條約的中朝條約文本分別見《人民日報》，1961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7 月 12 日，第 1 版。

¹³⁵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204-01456-01，頁 1-8、13-18。

¹³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423-424；《人民日報》，1961

中國駐朝使館根據對朝鮮報紙報導金日成這兩次訪問的分量和語氣，以及朝鮮幹部的談話分析，認為對中國「似更親切一些」。¹³⁷這個判斷固然不錯，中朝關係也確實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但朝鮮的收穫絕不僅僅是加強了與中國的關係，並以同盟條約的形式解除了志願軍撤軍所造成的三八線軍事防禦方面的壓力。實際上，通過對中國和蘇聯的等距離外交，金日成不僅鞏固了他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而且自認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以至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認為：三大提出的加強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友誼團結的任務已經完成，特別是這次金日成率團訪問蘇、中，在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方面起了劃時代的作用。¹³⁸

簡短的結論

深入研究中朝關係（包括蘇朝關係），對於解讀冷戰時期乃至後冷戰時期東亞的政治結構和及其發展趨向，探討朝鮮半島危機產生的根源及解決途徑，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從以上對歷史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戰背景下，中朝同盟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聯姻」，而非雙方宣傳的或人們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種「唇齒相依」的自然聯盟。

中朝關係屬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受歷史和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種關係曾處於朝貢體系之中，所謂「唇齒」聯盟、「鮮血凝成的友誼」，蓋源於此。戰後，特別是冷戰出現後，中朝關係便進入了新的國際體系。面對現代中朝關係，毛澤東既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周邊小國都要寬容並給以保護，又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對於毛澤東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點就是亞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所以，儘管朝鮮戰爭是中國被迫接受的既成事

年7月13日，第1版。

¹³⁷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201-00761-01，頁91-94。

¹³⁸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106-00578-03，頁19-21。

實，他仍然不顧個人屈辱和國家安危，毅然決定參戰；而當中共需要朝鮮勞動黨支援的時候，他不僅容忍了金日成對延安派的打擊和迫害，還要向朝鮮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

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小國無疑需要大國的保護。中朝同盟對於金日成而言，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他本人統治的工具。於是，在危急關頭，他只能承認陣營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理念，忍受國家主權和個人尊嚴遭受侵犯的現實。當國際鬥爭的中心轉移之後，作為革命陣營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朝鮮巧妙地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以求生存和發展。在兩個大國夾縫中的小國，或兩邊受氣，或兩面得利，金日成屬於後者。這裏的關鍵在於小國的戰略地位及其領導人的政治藝術水準。金日成適時地提出了朝鮮獨立發展的「主體思想」，其矛頭所指，不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除此之外，在國際關係體系中，中朝關係終究屬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故也體現出這種同盟關係的本質特徵，即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多變性，而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中固有的兩種結構性弊病。其一，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中，本來就沒有國家和主權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權，但黨內和陣營內部通行的最高原則還是國際主義；其二，在共產黨的組織觀念中，本來就沒有平等的概念，奪取政權以後，黨際關係中領導和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被移植到國家關係中。儘管隨著時間推移，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也逐步意識到國家利益應該是處理相互關係的政治準則，但卻沒有人能夠否定以往奉行的那些基本原則，因為一旦這樣做，就等於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¹³⁹或許，這就是中國和朝鮮在處理他們相互關係時所遇到的邏輯上的悖論。

¹³⁹ 筆者以中蘇關係為例對此有詳細論述，參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9-42。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檔號 106-00577，106-01613，106-10578，109-00828，109-01813，117-00125，117-00665，118-00080，204-00612，204-00761，204-00768，204-10454。

吉林省檔案館藏檔案，檔號 1-13/1-1957.41，1-14/1-1958.94。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卷 11。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未刊。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the Far East, Intelligence Report: Implications of Communist Chinese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March 17, 1958, MF2510409-007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АВПРФ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 ф. 059а, ф. 0102, ф. 5.

АПРФ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 ф. 45.

РГАСПИ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ф. 558.

ЦАМО РФ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 ф. 5.

ЦХСД (當代文獻保管中心), ф. 5.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二、專書

《金日成全集》，卷 8。平壤：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9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 1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卷 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中國朝鮮族歷史足跡編輯委員會編，《勝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一集）：1954 年日內瓦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 石源華編著，《中國共產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紀事(1921-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朴宣泠，《東北抗日義勇軍》。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
-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修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第 2073、2111 號，1956、1957。
- 劉金質等編，《中朝中韓關係文件資料彙編(1919-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盛曾安等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1946-60 年代初）》，卷 6。北京：東方出版社，1986。
- 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編，《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拉祖瓦耶夫關於六·二五戰爭的報告書》。首爾：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2001。
- 北韓年鑒刊行委員會編，《北韓總鑒(1945-1968)》。首爾：共產圈問題研究所，1968。
- 金南植、沈之淵編著，《朴憲永路線批判》，第五章。首爾：圖書世界出版社，1986。
- 徐大肅著，徐柱錫譯，《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首爾：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
- 康仁德編，《北韓全書》，上卷。首爾：極東問題研究所，1974。
-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ankov, Andrei.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
-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三、論文

- 丁雪松等，〈回憶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局駐朝鮮辦事處〉，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17 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 李丹慧，〈最後的努力：中蘇在 1960 年代初的鬥爭與調和〉，《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頁 132-162。

- 李香淑，〈關於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11月。
- 沈志華，〈中國對東歐十月危機的反應和思考〉，《史學月刊》，2007年第1期，頁75-89。
- 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9-42。
- 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82-109。
- 沈志華，〈史達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頁51-65。
- 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史達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收入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1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金景一，〈關於中國軍隊中朝鮮官兵返回朝鮮的歷史考察〉，《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頁52-61。
- 徐龍男，〈延邊籍朝鮮人民軍退伍軍人採訪錄〉，收入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7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梁鎮三，〈中朝在韓戰期間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0，2003年6月，頁55-98。
- 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總第96輯），頁8-36。
- 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pp. 9-24.
- Tsui, David. "Did the DPRK and the PRC Sign a Mutual Security Pact?"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 櫻井良子(Sakurai Yoshiko)，〈初次披露朝鮮戰爭真相——前高級幹部（李相朝）戳穿虛構的「金日成神話」〉，《文藝春秋》(Bungeishunju)，卷68期5，1990年4月，頁168-176。
-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四、報紙

《人民日報》，1953-1961。

丁雪松口述，楊德華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錄〉，《天津日報》，2001年3月14日，專副刊第11版。

五、口述訪問紀錄

沈志華訪問，〈柴成文口述紀錄〉，2000年9月12日。

As Close as “Teeth and Lips” or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Korean Alliance, 1946-1961

Shen Zhihua^{*}

Abstract

Mutual aid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North Korea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the proposed Asian Communist Intelligence Bureau, form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ino-Korean alliance. With Joseph Stalin's support, Kim Il-sung launched war against South Korea in 1950. In response, Mao Zedong decided to postpone the signing of the Sino-Korean alliance treaty. In order to end the war as soon as possible, Mao was anxious to dispatch Chinese troops to Korea. Kim was ambivalent and even rejected Mao's initial offer 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Moscow. Mao, however, was determined to fight the America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oviets agreed. After China entered the war, Stalin sided with Mao on all major strategic issues, which made Kim feel slighted and alienated.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Kim went to considerable lengths to stress North Korea's independence and began to purge his opponents within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The CCP strongly disagreed with Kim's handling of the Yan-an faction, and this threatened to destroy their alliance. Mao, however, needed North Korea due to the increasing Sino-Soviet divergence following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He thus took a conciliatory stance toward Kim and even initiated the proposal to withdraw the Chinese troops from North Korea.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thus improved, and the two parties signed a

^{*}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ilateral treaty in 1961.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hip was far from the alliance of “teeth and lips” portrayed in the propaganda of the day, but an unstable, conflict-ridden political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Keywords: Mao Zedong, Kim Il-sung,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Cold War